

“论文”与“明理”

——论明代《广文选》《广广文选》对《文选》的承变

郑天熙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明代《广文选》《广广文选》是《文选》的增广补遗本, 选文的时间范围与《文选》一致, 在编撰体例与选文上对《文选》均有继承, 但《广文选》与《广广文选》侧重于先秦及汉魏六朝文献, 并且有着程度不同的文章政教功用观, 要求所选文章有利于修身治国, 成为载道致用的“明理”教材, 这在《广文选》及其重订本中表现最为突出。《广广文选》则既尊崇六经, 又重视文采, 成为“论文”与“明理”兼具的《文选》广续本。

关键词: 广文选; 广广文选; 论文; 明理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20) 02-0080-07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0.02.012

“Exposition” and “Reasonability”: On the Inheritance and Changes of *The Anthology* by Liu Jie and *The Anthology* by Zhou Yingzhi from *The Anthology* in the Ming Dynasty

ZHENG Tianx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0631)

Abstract: *The Anthology* by Liu Jie and *The Anthology* by Zhou Yingzhi in the Ming Dynasty are the supplements for *The Anthology*, and there is the similar time ranges between the three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ompilation from the first two. However, the first two shows more literature befor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mor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civilization to some degrees, and the essays in them become the modals of “reasonability” for the civilization of public and the rules of the nation, which is emphasized in *The Anthology* by Liu Jie and its reordered versions. Then, *The Anthology* by Zhou Yingzhi become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Anthology*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exposition and reasonability because of the more attention to the six classics and language expression.

Key words: *The Anthology* by Liu Jie; *The Anthology* by Zhou Yingzhi; exposition; reasonability

《文选》自南朝梁昭明太子编成后,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围绕《文选》展开的注释、音韵、名物、版本、评点等研究历代不绝, 一部《文选》阐释史——“文选学”俨然已备^[1]。历代总集的编纂, 如《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文在》等无不在体例和选文上借鉴之, 足

见《文选》重要的典范意义。唐宋以来, 还出现了以“广”“续”“增”“补”等命名增广补充《文选》遗漏文章的《文选》广续本。如果明代《文选》评点体现了明人对《文选》这部文学总集的直接兴趣, 那么明代一系列《文选》广续本则显示出《文选》在明代文人中的典范效力以及明人

收稿日期: 2019-10-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古文选本的整理及研究”(17ZDA247); 中国博士后基金第66批面上资助项目(2019M662963)。

作者简介: 郑天熙(1990—), 男(仡佬族), 贵州遵义人, 博士后, 特聘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对《文选》的接受情况，不同于明代《文选》评点本对《文选》文本的直接研究^[2]，《文选》广续本真实地反映了明人受《文选》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文选》广续本在编纂意图与选文标准上呈现出与《文选》相似而又有差异的复杂关系，它表明明人接受《文选》并非被动与单向，而是明人主动参与的动态立体过程，具有鲜明的主体选择性与构成性。本文以明代两部流传甚广的《文选》广续本《广文选》与《广广文选》为考察对象，探究两部广续本与《文选》的复杂关系，揭示明代《文选》广续本对《文选》的承与变。

《文选》的广续本并不自明代始，唐宋时期已有《文选》广续本问世。^①目前已确定的明代《文选》广续本有七部：刘节《广文选》六十卷（亦有八十二卷版）、周应治《广广文选》二十三卷（亦有二十四卷版）、马继铭《广文选》二十五卷、李梦阳《文选增定》二十二卷，张溥《广文选删》十二卷、胡震亨《续文选》十四卷以及汤绍祖《续文选》三十二卷。七部广续本中，能见到全文的有刘节《广文选》、周应治《广广文选》、汤绍祖《续文选》、马继铭《广文选》以及胡震亨《续文选》，而以前两部流传最广，且增补文章的时代范围，与《文选》一致，皆是先秦及汉魏六朝。

《文选》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诗文总集。总集的出现，与古人文学实践的深入、文章体制日益丰富以及文章数量日渐增多有关。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总集具备文献保存与优选两项功能：“文章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故文章之衡鉴，作者之渊藪矣。”^{[3]1685}萧统在《文选序》里，也表达了总集的用途：“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缙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精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4]2}总集的保存性与优选性固是如此，何种文章应保留，何种文章应删舍，去取准则与选家的

编撰意图密不可分。编选意图作为一种主体选择，在总集中几乎不可避免，即使出于文献保存而编的总集，都不能完全抹去选择的主观性。四库馆臣认为，总集的编纂意图，有“明理”与“论文”两种，前者以真德秀《文章正宗》为代表，后者即以《文选》为代表：“文选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别出谈理一派，而总集遂判两途。”^{[3]1685}“《正宗》主于论理，《文选》原止于论文。”^{[5]1}真德秀出于“明义理，切世用”的目的，将《文章正宗》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四库馆臣批评其“以理为宗，不解诗人之趣。”但仍肯定其有“救浮华冶荡之弊”的功用。^[6]而《文选》一途，四库馆臣也认为“要各有当”，承认出于“明理”与“论文”两种意图而编纂的总集，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各明一义，未害同归”。^{[3]1685}

《文选》广续本是对《文选》的增广和续补，大都能继承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取标准以及“踵事增华”的文学发展观，属于与“明理”相别的“论文”一派。但这种“言各有当”的区分，在宋末陈仁子《文选补遗》中被打破，他开始在《文选》广续本中植入“论理”倾向，直接改换《文选》的“论文”特色。他批评《文选》“去取不免失当”，对《文选》的文体编排顺序尤为不满：“诏令，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人臣经济之方略；不当以诗赋先奏疏，矧诏令，是君臣失位，质文先后失宜。”^{[5]3}显然将真德秀《文章正宗》“论理”“切世用”的编纂意图强行纳入《文选》，在广续工作中《文选》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勿怪四库馆臣说：“以彼（《文章正宗》）概此，非通方之论。”“其说云补《文选》，不云竟以废《文选》。”^{[5]2}认为陈仁子的做法是废除《文选》。

不同于陈仁子《文选补遗》直接而强硬地改造《文选》，《广文选》与《广广文选》在增补《文选》的编辑工作中，对《文选》的编纂意图、体例、选文都有承续，表现出对《文选》典范的尊崇；同时又通过文章去取偏离《文选》的重文

①《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的《文选》广续本有：孟利贞的《续文选》十三卷、卜长福《续文选》三十卷、卜隐之《拟文选》三十卷。《宋史·艺文志》记载的《文选》广续本有：卜隣《续文选》二十三卷。

基调,渗透政教功用的文章观,使其兼具“论文”与“明理”两种功用,而政教观的渗透,又因不同的编选者而有强弱深浅之别,相对于《文选补遗》,明代的《文选》广续本与《文选》有着更为复杂的承变关系。

二

明代《文选》广续本的序跋对《文选》评价都很高。吕柟《广文选序》:“昔梁萧统编定《文选》,粤自秦汉,迄于齐梁,骚赋诗歌,诏策表启,时且千年,焕如其旧。”^{[7]507}李维桢《广广文选序》:“与《昭明》同时复有《词林》《文海》,而独《文选》传,迄今不衰。”^{[8]1}汤茂先则称赞《文选》“文圃之特秀,而选部之最都。”^{[9]1}这些赞誉体现出《文选》在明代的典范地位。明代《文选》广续本的编选,正是浸润在这种尊重经典与延续经典意识中。编选者普遍感到增补工作的艰难,认为《文选》“联络谨严,词义相结,骨肉交称,辟之采玉昆丘,连城毕获,拾珠渊海,照乘齐珍。若缀以余篇,将同附赘,试诂其片言,有类剥肤。”^{[9]1}是否能延续《文选》那样在文集保存与选优两方面的经典性,亦成为评价明代《文选》广续本优劣的标准,周应治在《广广文选》序中评价刘节《广文选》“检押综详,足为昭明忠臣,使作者不致淹没,有功于文苑大矣。”^{[8]8}更明显的尊崇,则体现在广续本对《文选》在体例和类目上的承续。

《文选》选文的时间范围是周代至梁,《广文选》与《广广文选》亦在这一时间段。《文选》在文体一级分类中,共有37种文体,可分为赋、诗、骚、散文四类,其中,赋与诗有二级类目,骚与散文无,这一基本的体例设置在《广文选》《广广文选》中得到贯彻,《广文选》共选文体50种,其中,对《文选》原有的37种,仅删除赋的“耕籍”、诗的“补亡”、“反招隐”、七、册、文、辞、连珠,保留原来29种文体;《广广文选》(六十卷)共选文体58种,仅删除《文选》赋“郊祀”

“耕籍”、诗“反招隐”、奏记、对问、史述赞、哀、行状、弔文,保留原来28种文体;^①同时,在文体顺序安排上,两种广续本也都大致遵循《文选》的顺序,以赋为首,诗骚其次,散文最末。单从文集的体例和类目来看,可以说《广文选》与《广广文选》的确称得上是“昭明忠臣”,相对于《文选》在文体类目与选文数量上都有增广,不过它们对《文选》原有的文体都有承续,表现出对《文选》典范意识的尊崇。

那么,《广文选》与《广广文选》有没有做到在编选意图上完全贯彻《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论文”目的呢?没有。这里反映出很有意思的问题,即二书虽然在体例与选目上,与《文选》保持较大程度的一致,甚至在序跋中高度赞扬《文选》的经典性,包括二书在内的明代一系列广续本在外观形式上都与《文选》“形似”,但如果深入分析广续本的序跋、凡例以及具体的选文就会发现,广续本在表面上尊崇《文选》,而实质上却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文选》的编选意图,或是重文献搜集保存而不重文采辞藻,或是渗透进深浅不同的政教文章观,在尊崇《文选》时“有意的误读”,借《文选》的经典地位达到编选者自己的目的。

三

王廷相《广文选序》:“自夫崇华饰诡之辞兴而昔人之质散,自夫竞虚夸靡之风炽而斯文之致乖,言辩而罔诠,训繁而寡实,于是君子惟古是嗜矣。梁昭明太子统旧,有《文选》之编,自今观之,颇为近古。然法言大训,懿章雅歌,漏逸殊多。词人藻客,久为慨惜。然未有能继其旧贯者。”^{[7]506}这里有四点值得注意。第一,王廷相对文章由质朴到华丽的发展过程持否定贬斥态度。萧统在《文选序》中也提出文章“踵事增华”的发展历程,但认为这是“物既有之,文亦宜然”的自然过程,不仅不排斥,反而欣赏之,并以“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为选文标准,与王廷相形成鲜

^①这还不算古代文集编纂时对文体归类存在的模糊现象,如《广广文选》虽然没有奏记,但有奏,与奏记基本属于一类文体,还有《文选》中的对问,《广广文选》虽然没有“对问”,但有“对”、有“问”两类,故也可以认为《广广文选》还保留了《文选》的奏记与对问。这里仅就《文选》类目名称作统计。

明对比。第二，对《文选》“近古”的评定，视《文选》大量辞藻华丽、声韵协和的汉赋、六朝骈文以及讲究对偶藻绘的如颜延之、谢灵运等诗作不顾，将《文选》视为一味“嗜古”的文集。而萧统在选文时，主要是略古详今，且重文采声律。王廷相认为《文选》近古，是明显的误读。第三，虽然《文选》的广续者都是为增补其所遗，但王廷相对《文选》的遗漏之作有范围界定，换言之，如果《文选》对文献有所遗漏的话，最不该漏的就是“法言雅训”“懿章雅歌”。因为这两类属于载道之文，有功于修身与政教。第四，王廷相认为《文选》要增广，就只能增载道之文，有修身治国之用，并认为刘节的《广文选》做到了这一点：“君子修辞虽雄深博雅，力总群言，而无当于修己经国之实者，自负曰文，去文万里矣。此又梅国广选之深虑也。”^{[7]507}

王廷相在《广文选序》中表达了其尚古拙今，崇朴斥华文学观以及修己经国的文章功用观，在定位《文选》为“近古”的误读下，认为《文选》应增加载道之文，以收文章政教之用。而《文选》不录儒家圣贤之作，正是在于区分了儒家经典与“文”的不同。实际上，萧统并没有否定儒家著作的经典地位，认为它们“与日月具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加芟夷，加之剪裁。”^{[4]2}只是选取标准在“文”，故不录。王廷相为《文选》植入政教功用观，肯定刘节加入儒家雅正作品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在推举《文选》（“近古”）的背后已经偏离了《文选》的编选意图，减轻甚至遮蔽《文选》的“论文”倾向，在《广文选》中加重或主打“明理”色彩。

我们再来看看《广文选》具体的类目及选文情况。现存《广文选》有八十二卷与六十卷两个版本，分别刊行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与嘉靖十六年（1537年），六十卷本为陈蕙改定之本，与刘节原本差异较大，需要分开讨论。^①刘节八十二

卷《广文选》增加赋的“天地”“草木”“杂赋”二级类目，分别选1首、17首和34首。增加诗的“逸诗”“操”“谣”二级类目，分别选了14首、16首、11首。将《文选》原有赋的二级类目“郊庙”并入“乐府”，将“七”类并入骚。增加的散文文类有玺书、赐书、策、勅、谕、策问、疏、启、弹事、封事、议、对、对策、问、传、说、祝文、杂文，共18种。在具体的选文上，《文选》录乐府40首，《广文选》录乐府376首；杂歌类诗作，《文选》只选4首，《广文选》选74首；《文选》录杂诗51首，其中陶渊明4首，《广文选》录杂诗99首，其中陶渊明33首。陶渊明在萧统重“文”的标准中不被欣赏，《广文选》却大量选录，乐府因“缘事而发”，较少文采，萧统也收录甚少，《广文选》则大量补充乐府，在新增的34首“杂赋”类赋作中，含有数量较多的咏物赋，如《蚕赋》《酒赋》《镜赋》《火赋》《白发赋》，等等，是对《文选》赋作分类与内容的补充，这说明，八十二卷《广文选》不是在萧统重视文采的标准下选文，而是以搜集存备六朝及前代文献的目的来增广《文选》。应该说，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文选》的编纂意图。如果我们认为《文选》也有文献保存的功能，明代《文选》广续本只是更全面地网络文献，那么，八十二卷《广文选》的编选，虽然没有严格执行《文选》选文标准，但突出了《文选》的文献保存目的，还不算偏得太远，至少没有加入明显的主观意图。同时，八十二卷《广文选》有大量诸如《美人赋》《神女赋》《宋公九锡文》《晋公九锡文》等不利于政教之作，王廷相在《广文选序》中强调的文章修身政用功能并没有在刘节八十二卷《广文选》中凸显出来。但在陈蕙修订过后的六十卷《广文选》中，情况则有很大的改变。

陈蕙在《重刻广文选后序》中说：“顾其中

^①本文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刘节八十二卷《广文选》为考察对象。此版八十二卷《广文选》，篇首除王廷相与吕柟序，还有未署名的《校正广文选凡例一十二条》，笔者经仔细核对后发现，该本后面的正文，保留了《校正广文选凡例一十二条》全部删去的篇目，即正文完全没有贯彻此《凡例》。根据六十卷本《广文选》陈蕙的《重刻广文选后序》可知，《凡例》为陈蕙后来重订时所写，体现的是陈蕙的编选意图与选文标准。因此合理的推测只能是，目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的八十二卷《广文选》不是嘉靖十二年初刻本，是后来的刊行本，刊行时将陈蕙在修订本中写的《凡例》也加到刘节八十二卷上了。

(八十二卷《广文选》) 讹字逸简杂出, 又文义之甚悖而俚者间在焉, 覩者病之。况其板既不存, 予尤惧于日就废阙。”^{[10]391} 刘节《广文选》八十二卷到嘉靖十六年(1537年)时刻板已失, 加上原刻本在校勘和选文上都有不少问题, 陈蕙才决定重新修订, “删去者二百七十四篇, 增入者三十篇”, 编成六十卷本。陈蕙的修订, 除了更加丰富选文内容, 较刘节原本突出了明显的政用意识。

第一, 陈蕙继续刘节《广文选》搜集上古及秦汉魏晋文献的编选目的, 使《广文选》内容进一步丰富, 较完整地体现上古即秦汉魏晋的创作实际。突出体现在乐府的选录上。乐府在汉魏时期大量涌现, 萧统出于重视文采, 遗漏较多, 刘节选入376首乐府, 陈蕙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 并进行分类。如刘节只有“汉鼓饶歌”“魏鼓吹曲”两种地域性乐府, 陈蕙则加入“吴鼓吹曲”(2首)、“晋鼓吹曲”(3首)、“宋鼓吹曲”(6首)、“梁鼓吹曲”(5首), 使《广文选》中的乐府更能全面地反映当时各地的创作实际与风格。这是对刘节八十二卷在文献保存上的承继。

第二, 陈蕙对刘节本《广文选》进行删补, 以突出《广文选》的载道功能。陈蕙删除的文章, 主要有五类:

1. 儒家圣贤之作, 认为它们不能与文士之作并列, 以见“尊圣”之意。如大舜《思亲操》《卿云歌》, 大禹《襄陵操》, 文王《拘幽操》、武王《克商操》、周公《越裳操》、孔子《文王操》等;

2. 有悖纲常, 无益教化之作, 如《宋公九锡文》《晋公九锡文》《元后诔》《说皇甫嵩》等, “忠臣贞士何观焉?”^{[10]509}

3. 短浅俚俗, 不可为训之作。如赋类《美人赋》《神女赋》《江妃赋》《骷髅赋》《淮海赋》《芙蓉赋》《菊花赋》《琴赋》《几赋》, 乐府类《乌生》《焦仲卿妻》《苦寒行》《短歌行》, 还删除了刘节八十二卷《广文选》中有的“七”“连珠”“谣”, 认为这三类文体“肤浅”“无关文义”, “虽不多立篇目, 固无害其为广也。”^{[10]510}

4. 词义深奥难懂之作, 如汉饶歌《思悲翁》《艾如张》《圣人制礼乐》《蜚蝶行》《巾舞歌》等;

5. 缺误无证、重出之作。如《石鼓文》《汉酸枣令刘熊碑文》《汉北海相景君碑文》《游钟山》

《飞鹤行》等。

同时陈蕙又增入“文义正大高古”“有汉魏风”之作。如在杂文中增加《国语》6首、亢苍楚《政道》《君道》《贤道》《农道》4首、刘安《汜论训》《泰族训》2首, 以及沈约、王筠、刘孝绰的《应招诗》等。

第三, 除了通过选文的增删, 渗透文章的政用意识, 陈蕙还在《重刻广文选后序》中申明对文章“载道”的理解, 以期让《广文选》成为修身治国的教材, 完全贯彻王廷相在《广文选序》中表达的思想。针对修订后的《广文选》不是每一篇选文都是正面的教导, 陈蕙说: “盖言而善, 以迪斯人而与之式, 固载道也; 言而不善, 使人知所避以免, 无或陷焉, 亦载道也, 则固不必一一流于道以为言矣。”^{[10]391} 即使《广文选》中有些选文没有正面的教育作用, 也可作反面例子, 让人避免犯类似错误。这样一来, 《广文选》变成使君子“达政事”“经上下”“稽度数”“别品物”的教材, 离《文选》原来的编选意图不啻千里。

我们看到, 刘节八十二卷《广文选》虽然没有严格执行萧统“论文”的选择标准, 但还是广泛地搜集了《文选》所遗漏的文章,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上古及秦汉魏晋的文学创作实际, 对《文选》编纂意图有所偏离, 但并不是太远, 与王廷相序中所言也有所差距, 而陈蕙修订本六十卷《广文选》则是王廷相序的忠实信徒, 他对刘节本大刀阔斧的修订, 以文章政教观为标准, 删去大量不具备典范教育意义的“俚俗”“浅显”的文章, 给《广文选》渗透进浓烈的政用修身色彩, 完全背离萧统《文选》重视文采辞藻的编选意图, 在大致遵循《文选》的文类体例与排布顺序下重构《文选》, 使《广文选》成为儒家经典那样的“明理”之作, 几乎不见陈蕙在凡例与后序中对《广文选》中的文章在声律词采方面的任何评价。

四

至迟成书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广文选》是对《广文选》的再次增广补充, 编者周应治没有延续陈蕙修订《广文选》的倾向, 而是重回刘节八十二卷《广文选》保存文献的编选

目的，但也表达了对经典的尊敬，在编选意图上体现出对刘节（文献保存）与陈蕙（政用修身）的调和，同时从文章自身的角度选文，将编选意图从陈蕙《广文选》的“明理”的再次拉回“论文”。

萧统有“踵事增华”的文学发展观，因此《文选》选六朝文章较多，遗漏不少先秦汉魏文章，“《选》操一切绳墨，所遗宜多，《广》于汉颇详，然遗者十二，晋魏以下，遗者不第十八。”^{[10]391}《广文选》《广广文选》主要是从保存文献的角度对《文选》进行补遗。在陈蕙六十卷《广文选》的基础上，《广广文选》增加了赋的“象数”“时令”“器具”“寺观”等4种二级类目以及教、谣、七、盟誓、文、册文、诰、赦文、移、训、诫、篇、体、难、讥、解、辞、繇辞、自序、连珠等20种文类，尤其注意的是，谣、七、连珠等文体，在刘节八十二卷《广文选》中已有收录，但被陈蕙在修订时因“肤浅”“无关文义”被删除，而且，《广广文选》还增加了尧的《神人畅》、舜的《南风操》《箕子操》、孔子《息鄆操》，并与卫女《思归引》同列，陈蕙明确提出“尊圣”，不能将圣人之作与一般文士之作等观，《广广文选》将它们并列，在思想上较陈蕙开明，没有过多儒家尊卑观念的影响，目的是在保存文献而非载道见志。这说明在《广广文选》比《广文选》较少受到文章政用观的渗透。

在《广广文选自序》中，周应治表达了六经为文章之源的观点：“六经之文与天同尊，与地同厚，于絜乎揭日月而恒新，则信无能袭六而七矣。其余绪为汉魏，为六朝。”^{[8]18}这种宗经思想，与陈蕙删去圣人之作，不与文士并列是一致的。不同在于陈蕙尊圣导向文章的政教修身之用，进而选文不重视文采，周应治宗经，恰恰相反，是给汉魏六朝的存在及其文采作理论支持，论证六朝讲究文采的合法性，进而指出汉魏六朝文章“片词只语在所甄录，不可缺略者也。”^{[8]18}明代文章学大盛，文源六经说是较为广泛的观念，“迄今之作，其原于经。《易》言阴阳，知性命，斯无拘泥。《书》纪绍元，著事功，斯无警讦。《诗》教淳良，出词气，斯远暴慢。《礼》用节文，动容貌，斯立威仪。《春秋》断事，正名分，斯决是非：实文之宗也。”^[11]六经在这里是一切文章的文体学来源，而

非强调思想，周应治尊六经，从而认为汉魏六朝文章由六经而来，也应保存，而不是陈蕙那样要求一切文章都载道明理。

周应治在《广广文选议例》中说：“文之所广者，在于文”；“其尔雅瑰丽，不诡于体者概不敢遗”，表明他是从文章自身而非文章政用修身的角度选文，并且扩大了《文选》的选文范围，《文选》中没有选择子史，《广文选》开始增入子史类文章，《广广文选》则进一步增补，并评价到“如管子之《问》篇，刘子之《知人》篇，亦文之最奇诡者。”《广广文选》将《广文选》中属于序的“自序”单列为一目，并认为“若《汲冢》之古，《法言》之沉雄，《典论》之宏肆，亦甚奇绝矣。”^{[8]11}这些都是对文章自身艺术风格的评价。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都是从文章自身出发，《广广文选》与《文选》还是有差别：前者纯就文章形式作评论，后者则是站在文学进化观的立场，欣赏富于声韵词采的文章。故《文选》选入大量追求声色的六朝骈文，周应治则不同，他没有详今略古，只是站在文章形式上作艺术评论。

五

明代《文选》广续本相对《文选》，更注重文献的搜集网罗，“广之以备遗焉”^{[10]508}“今之视六朝犹昭明时之视三代两汉也，六朝所不忍遗，而况三代两汉片言只字留在人间，岂可弃乎？”^{[8]6}重视文献的搜集保存，就不能在编选标准上设置太严，这是与《文选》的第一个不同，《文选》也有资料存备功能，但主要侧重于收录六朝讲究声律辞藻的文章，有萧统明确的收录标准。《广文选》《广广文选》则对《文选》进行增广补充，务求全面保存上古文献。“昭明意哉垂后，故其裁取也严，君衡（周应治）意在稽古，故其蒐收也广。”^{[8]7}由于重在文献保存，《广文选》《广广文选》很难兼顾到文采的标准，甚至以搜集上古文献以防散佚为全部编纂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基本遵循《文选》体例的前提下，《文选》广续本也编者的不同思想倾向而呈现出不同的面目。《文选》本是“论文”之作，而《广文选》及其重订本不断地加入“明理”倾向，注重选文的政教修身功能，这与嘉靖中期复古

派逐渐弃文入道，表现出重道轻文的思想有关。^[12]《广文选》刊行时的嘉靖十二年（1533年），正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末期，复古诸子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下，复兴治世的理想难以实现，均遁入个人心性的思考与修养，道学成为他们的精神皈依。由道学观文章，使复古诸子大都持文以载道的文章观。《广文选》及其修订本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受到文章政用意识的全面侵入，《文选》的“论文”色彩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借文“明理”，以文言道，籍文修身。为《广文选》写序的王廷相、吕柟等人，皆有理学背景，王廷相还对早年沉溺诗文而后悔：“大抵体道之学，缓急有用于世；诗文之学，君子固不可不务，要之辅世建绩寡矣，而不适用也。”^[13]故他对《文选》重视文采有意视而不见，推崇《文选》“近古”。应该说刘节八十二卷《广文选》还是以资料保存为主，并没有王廷相在序中那样的“论理”色彩，而陈蕙修订本《广文选》则对刘节本进行大刀阔斧的删改，完全贯彻王廷相序中的文章政用观，将《广文选》编成君子修身经国的教材，《文选》的“论文”宗旨在陈蕙《广文选》中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载道、“论理”。而周应治编辑《广广文选》，已经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复古派弊端尽显，程朱理学也因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等人冲击而失去权威，士人竞相挣脱理学教条的束缚。《广广文选》在思想宽松活跃的环境中，可以相对自由地编选文章。周应治虽然有宗经的思想，但具体在选文时，注重的仍是古文献的保存，重新将陈蕙删去的文章增入，呼应了《文选》重视文采的选文标准，选入“尔雅瑰丽”之作，使《广广文选》在重视文献存备的同时，保留《文选》重文的特色，成为“论文”与“明理”兼备的《文选》广续本。通过《广文

选》与《广广文选》的考察可知，明代《文选》广续本，一方面以周秦汉魏文献的保存为主，在选取标准上较《文选》放宽；另一方面，《文选》广续本的编选，与明代特定的文学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要而言之，在古代的文化环境中，以纯“论文”为目的的文章总集，都会程度不同地受到“明理”（载道）观念的渗入，或者完全改变其“论文”倾向，或二者兼而有之。

[参考文献]

- [1] 骆鸿凯. 文选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2] 王书才. 明清文选学述评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44-84.
- [3] 永瑢, 纪昀, 等, 纂. 四库全书总目: 卷186 集部三十九 总集类一 [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4] 萧统. 文选 [M]. 李善,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5] 陈仁子. 文选补遗 [M]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360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6] 真德秀. 文章正宗 [M]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355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2.
- [7] 刘节. 广文选: 卷82 [A]. 嘉靖十二年刊本. 东京: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 [8] 周应治. 广广文选: 卷24 [M] // 四库存目丛书续编: 第19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9] 汤绍祖. 续文选: 卷32 [A]. 万历三十年希贵堂刻本. 北京: 国家图书馆藏.
- [10] 刘节. 广文选: 卷60 [M] // 四库存目丛书·集部: 第298册. 首都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六年陈蕙刻本.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11] 曾枣庄. 中国古代文体学 [M] // 明代文体资料集成: 附卷2.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396.
- [12] 廖可斌. 明代文学思潮史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187.
- [13] 王廷相. 王廷相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482.